

周作人研究 历史与现状

黄开发

著

·海韵楼小集·

周作人研究 历史与现状

王德胜

·海韵楼小集·

黄开发
著

周作人研究 历史与现状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黄开发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研究历史与现状 / 黄开发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4

(海韵楼小集)

ISBN 978-7-205-08227-7

I. ①周… II. ①黄… III. ①周作人(1885~1967)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5006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邮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刷: 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张: 19.25

字数: 330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装帧设计: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王静等

书号: ISBN 978-7-205-08227-7

定价: 40.00元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开始期（1919—1949）	6
第二章 周作人研究的恢复期（1980—1989）	32
第三章 周作人研究的成长期（1990—1999）	49
第四章 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期（2000—2009）	71
第五章 周作人文集的出版（1981—2010）	133
第六章 周作人研究的史料建设（1979—2009）	148
结 语 周作人研究的价值标准	194
周作人文集目录（1981—2011）	204
周作人研究资料要目与索引	214
附 录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	250
需要一种学术态度	255
关于《沈启无自述》	262
沈启无自述	268
后 记	301

引言

周作人是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刻影响的作家。他和鲁迅一样，都是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通过各自的努力，从不同方面，为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是由于在抗战时期未能保持自己的节操，附逆投敌，他的名声才黯淡下去，以至于到了被遗忘的程度。到了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性，又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1986年，舒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5期上连载长篇论文《周作人概观》，产生了广泛影响。舒芜指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在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设方面，在思想革命的号召和实行方面，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探索方面，在小品散文的创作方面，“成就和贡献都是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为“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因为“周作人的悲剧，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对周作人研究意义的肯定，其实也就是从另一角度对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他做出过如此高的评价。

那么，舒芜是不是剑走偏锋、立异唱高呢？下面来当一次“文抄公”，摘抄几个重量级人物的评价看看。对于周作人，早在1946年，郑振铎就说过与舒芜类似的话：“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

上便要黯然失光。”^①郑振铎是新文学的重要参加者，又是一个文学史家，说话的时候周作人已经沦为了阶下囚，他的评价应该是可信的。观点与郑振铎相近的还有周氏兄弟的朋友曹聚仁，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文坛五十年》一书中说：“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确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我们治史的，并没有抹消个人主义在文艺上的成就；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但从现在中国的社会观点说，此时此地，有不能不抉择鲁迅那个路向。”^②接下来再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胡适的评价。陈之藩《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③一文记述：

胡先生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我如果说：“不要打呀！苍蝇正在搓搓手搓搓脚呢。”（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引用日本小林一茶俳句，原文为：“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黄按）他似乎就想起了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忆的茫然的眼光里，我看出胡先生对朋友那份痴与爱。

在胡适说话之时，到底还有几个作家值得一读，姑且不论；他单单举出周作人，可见推重之高。另据周建人回忆，冯雪峰说过：“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④冯雪峰是一个左翼作家，应该不会有吹捧周作人的嫌疑。上述几个文化名人的立场各自不同，说话的时间和场域也不同，但他们的话都明确无误地强调了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屈指可数的几个最重要文学家之一的存在。

在中共高层，也有深知周作人的价值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湖南岳麓书社的老编辑钟叔河想重印周作人著作集，然而在当时面临重重障碍，无法正常获批，于是直接给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写信。岳麓书社的报告最后得

① 郑振铎：《惜周作人》，1946年1月12日《周报》第19期。

②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2版，193页。

③ 陈之藩：《纪念适之先生之八》，收入《在春风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131—132页。

④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到了胡乔木的批准。后来黄裳在1991年5月19日致钟叔河的信中披露：“去年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①以周作人的“护法”自居，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匪夷所思。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周作人就得到过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的照顾和安排。在《胡乔木书信集》里，有1951年致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给周扬，现一并送上。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敬礼
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批示了两个大字：“照办。”^②这以后周作人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从1955年1月开始，他每月取得稿费200元，一度增加到每月400元。正是由于得到了高层关照，他才得以在北京度过相对平静的晚年生活。

再说对作为散文家的周作人的评价。郁达夫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把十分之六七的篇幅让给了鲁迅（24篇）和周作人（57篇），这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在《导言》中解释道：“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到了20世纪90年代，楼肇明在其所编《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的序言中说：“在我看来，‘五四’现代散文成就大，优秀作

① 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编者前言》，《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② 胡乔木：《胡乔木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61—62页。

家人数众多，但真正以完备的审美体系在审美路标意义上影响了同时代及后世作家的，当推鲁迅和周作人，而其他作家像郁达夫、朱自清、冰心、许地山、徐志摩等有成就有风格的杰出散文作家，则是环绕在这两座高峰之间大小不等的山峰。”^①著名学者陈平原在引用郁达夫的评价后说：“六十年后，重新引述此段文字，几乎不必作任何改动。也曾出现不少显赫一时的散文家，但周氏兄弟始终是两面不倒的大旗。近百年中国文坛上，小说、诗歌群雄角逐，唯有散文双峰并峙——周氏兄弟的地位无可争议。”^②

类似的重要评语还有不少，不遑遍举。既然周作人的历史地位如此之高，那就不应该以政治的标准代替一切，因人废言，而应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实事求是地去评价他的功过是非。这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对周作人研究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认真求实地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和教训，是为了继承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为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参照，更好地开拓未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一个现代文学大家的研究都有一种或多种研究评述的专著，而周作人研究还没有，这与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而周作人研究的复杂性又远远大于一般的文学大家，更需要对研究的本身予以专门、深入的总结和探讨。温儒敏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把“开展周作人研究史的研究”视为周作人研究可能的新增长点之一，并指出：“周作人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焦点人物，他的活动贯穿了20世纪的三分之二时段，回顾周氏的兴衰沉浮历史，可以窥探20世纪中国的诸多思想命题、文化奥秘。”^③同样，一部周作人研究学术史不仅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同样也从特定的方面反映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侧影。

本书第一次全面回顾中国大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进程。大致按时间次序把周作人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加以考察，前四章均分别从专书（专著、论文集等）、思想与人生道路研究、文学思想研究、文学创作研究等方面评述，第五、第六两章评述周作人文集的校订出版与史料工作的建设，则根据对象的特点单独成章。周作人研究的第一篇专门文章是赵景深发表于1923年1月的《周作人的诗》。不过，关于周作人的零散的评论可以上溯到1919年傅斯年、钱玄同、罗家伦、胡适等人的论文，他们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在新文学运

① 楼肇明：《南天一隅，重峦叠翠，万壑争流的散文风景线——〈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代序》，《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2月。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353页。

③ 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386页。

动之初的赫赫功绩。如果从 1919 年开始算起,中国大陆周作人研究已经走过了 90 多年的风风雨雨。这 90 多年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49 年以前为周作人研究的开始期,有关的论文绝大多数是一般性的评论,真正达到学术研究层次的甚少。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研究工作因为周作人的附逆投敌而出现了转折。1949 年以后又经历了长达 30 年的停滞,周作人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一直到 1980 年,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周作人研究重新起步。20 世纪 80 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绩斐然,然而研究者受到一些“左”的思想观念的掣肘,于对象还或多或少地有点“隔”,这是周作人研究的恢复期。20 世纪 90 年代是周作人研究的成长期,研究者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独特的艺术与精神世界中去;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图建立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广泛联系。进入新世纪以后,周作人研究到了深入期,不少重要的方面都有了专攻,而不是泛泛而论,如周作人的“人学”思想、女性思想、文学思想、文学翻译等。迄今为止,已出版了周作人研究著作 40 余部,这是研究成就的集中体现。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有几个重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周作人是不是一个思想家的问题、对其后期“抄书体”散文的评价问题、周作人与中国文学传统问题,以及评价他的价值标准问题。因此,本书以这几个主要问题为“剧情主线”,并对此进行探讨。

本书附录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我与别人关于周作人的论争文字,还有一篇由我整理的沈启无自述。沈启无被称作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后来又被逐出师门。他的自述包括了不少关于周作人和沦陷区文坛的珍贵资料。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力图做到:历史评述与理论探讨相结合;以辩证求实的态度,坚持政治的标准与思想文化的标准相统一,既充分肯定研究对象的贡献和历史地位,又对其附逆行为和消极的思想进行分析、批判;注重考核史料,考察和分析研究文献的历史语境和研究者个人思想、学术语境。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开始期（1919—1949）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关于周作人的各类专文在200篇左右，其中论文约占三分之二。在论文中，绝大多数是一般性的评论，真正能达到学术研究层次的极少。本书取材的标准较宽，不仅专文，别的文章和著作中有关周作人的有价值或有代表性的观点也在评述之列。1949年以前30年的周作人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19年到1929年，这是周作人研究的开始阶段；二是从1930年到1937年7月，为周作人研究的丰收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37年8月到1949年，由于周作人的附敌行为，研究工作出现了变化，不妨把这一阶段称为转折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是没有周作人研究的，但在50年代和60年代周作人还是被谈论着，当时人们对待周作人的态度也是我所感兴趣的，故在本章后面还附有对这一情况的介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的，他在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翻译论文《陀思妥也夫斯基之小说》，第一次在新文化运动这一主要阵地上登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专门评论周作人的第一篇文章要算赵景深发表于1923年初的《周作人的诗》^①，该文记下了他读周作人几首新诗后的一些清浅的感受。不过，关于周作人的零散评论可以上溯到1919年几个新文化运动主要参加者的论文，他们

^① 1923年1月《虹纹季刊》1卷1期。

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之初的赫赫功绩。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①中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思想革命》一文,他还说:“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一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得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又云:“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傅文的基本思路和观点都深受周作人的启发,由此可见周的文章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深刻影响。周作人的新诗创作体现了胡适所要求的文学形式变革的实绩,他的《小河》很得胡适的赏识:“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绝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②钱玄同的《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③表扬了周的翻译工作:“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意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旨’的办法,强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来的翻译界中,都是开新纪元的。”罗家伦于1920年发表《近代中国思想的变迁》^④,在称赞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新文学的主张说得透彻后写道:“后来周作人先生更明白提出‘人的文学’的观念来,把‘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意思,合在一起来讲,是分外明晰的;因为这两件东西,原来是分离不开。思想革命是文学革命的精神,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工具:二者都是去满足‘人的生活’的。”这几则评价正好涉及了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三个主要方面的贡献。

“五四”退潮后,作为小品文作家的周作人又走入人们视野。中国现代散文的最初发展经历了从《新青年》上的论文、杂感到周作人首倡并实践的小品文的转变,小品文在散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独立门类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此,胡适认识得很清楚:“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

① 1919年5月《新潮》1卷1号。

②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收入《胡适文存》1集。

③ 1919年11月《新青年》6卷6号。

④ 1920年9月《新潮》2卷5号。

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①这段话后来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原因就在于胡适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现代散文最初的发展、嬗变，指出了周作人对现代散文史的一个重要贡献。《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汤钟瑶在《读了〈自己的园地〉》^②中说：“我读了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园地》，觉得这本小品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东西。飘逸的语句，缜密的文思，很可开话体论文作家的先河。”郭沫若的文章《批评—欣赏—检查》^③的主要内容是对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自序中所表明文学批评观提出商榷，不同意周作人的观点，认为他“把客观的检察完全剔出主观的欣赏以外，并且说欣赏便是真的批评，检察便是假的批评”，但也称赞道：“这些文字我们在报章上虽然早已见过，但是这么搜集起来，便成了个整饬的花园。我们在此虽然看不见若何伟大的景物，但尽有优逸的草花，玲珑的喷泉，和些精巧的接骨木，足以使我们娱目畅怀。”赵景深的《读〈西山小品〉》^④以周作人同时期发表的作品为线索来探讨《西山小品》，认为“《西山小品》是表现作者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朱光潜在《〈雨天的书〉》^⑤中相当敏锐地指出了《雨天的书》的审美特质，尤其值得嘉许的是他已经注意到了其中的复杂性。他说：“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清”指的是清谈闲散，是对作品中反映出的作者的心情而言的，“冷”指的是文中可以依稀辨出的“师爷气”，“简洁”是从文字方面来说的，肯定了初期白话文存在较严重欧化的情况下周作人对古文的借鉴。冬芬的《读〈谈虎集〉》^⑥从深刻地发掘中国民族的病根的角度，肯定了《谈虎集》的思想意义。钟敬文曾是知堂散文艺术的学习者，在《试谈小品文》^⑦中对周作人的人和文大加赞美：“他的文体是幽隽淡远的，情思是明妙深刻的，在这类创作家中，他不但在现在是第一个，就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似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偶呢。”

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如他对民俗学和儿童文学的提倡与卓有成绩的工作就很少有人顾及，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原载1922年《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收入《胡适文集》2集。

② 1923年10月9日《晨报副镌》。

③ 1923年10月《创造周报》25号。

④ 1925年5月23日《京报副刊·文学周刊》21期。

⑤ 1926年11月《一般》1卷3号，署名“明石”。

⑥ 1928年1月27日《语丝》4卷7期。

⑦ 1928年12月《文学周报》7卷24期。

显然时代的迫切需求制约了人们对周作人的接受。不过，知道真价的人并非没有。梁永福的《〈谈龙集〉》^①就肯定了周作人对民间歌谣和儿童文学的介绍和倡导。杨晋豪的《周作人先生》^②说得更明确：“中国对于民间文学，果然也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但我以为注意民间文学较为切心的人，周先生确要算其中的一个了。而格外他是一个很注意儿童文学的一个人。像《谈龙集》中的《读各省童谣集》《读童谣大观》《吕坤的演小儿语》《谈目连戏》《猥褻的歌谣》及《江阴船歌序》《潮州畚歌序》等中，他都很显明地叙述出他对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意见；我以为他用忠诚的态度和虚心的观察之对于它们的研究，其价值也不下于他的介绍外国文艺的伟功的。”这里只能说是注意到，因为依据的材料还很有限，当然也谈不上展开论述了。

二

一开始阶段的周作人研究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过于集中在某一方面或单篇作品、单个文集上，个别的结论尚未提升为普遍的理论突破，因此这一时期还没有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20世纪30年代是阶级斗争激烈和派别之争纷繁的时期，革命文学勃兴并取得了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周作人日趋系统化的世界观、文艺观及其影响对革命文学构成了挑战。因此，他是革命文学回避不开的存在，革命文学必须对他的存在做出反应。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论争。论争一方面刺激了周作人研究的开展，引导人们以更宏阔的视野在更深层次上认识他，于是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局限，使评论和研究掺入了过于直接的功利成分和情绪因素。

进入30年代的第一年，周作人就遭到一次来自左翼青年的讨伐。这次讨伐发生在北平的《新晨报》副刊上，肇端于黎锦明发表于3月24日的《致周作人先生函》。黎文对革命文学的势力迅速扩大表示不满，并就这一问题向周作人请教。周作人的《半封回信·致锦明》发表于4月7日的《新晨报》副刊上，他讽刺了革命文学，表明了自己对于文学的几点意见，并说：“现今文学的堕落的危机，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于它的营业化，这是落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再也爬不上来。”周作人的态度和观点遭到了几个革命青年的攻击。从4月10日到5月31日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有17

①② 1928年7月《开明》1卷1期。

篇之多，其中有两个作者的三篇文章是对周作人表示理解和替他辩护的，还有周作人自己的一篇文章。左翼青年们试图以唯物史观和革命文学理论来评价周作人，但只停留在一加一的水平上，并没有深入下去，还夹杂了不少意气成分。周作人对此表示不屑，当有人误解他的《金鱼》一文是为答复批评而作时，他才写了一篇只有百余字的短文《写〈金鱼〉的月日》予以说明。

接下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公案——《五十自寿诗》事件。1934年4月5日，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创刊，创刊号上登载了周作人的自寿诗的手迹，并配以大幅照片^①。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诗。不久，蔡元培、沈兼士、胡适等人也纷纷唱和。周作人的诗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一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钱理群在《周作人传》^②第七章云：“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发出来的，是中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内心的一次审视：有无可奈何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

埜容（廖沫沙）在4月14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人间何世？》一文，率先对《人间世》和周作人的自寿诗发动攻击，说周作人的十六寸的照片像遗像，手迹如同遗墨，并和了一首讽刺诗。《人间世》提倡小品文，在取材上标榜“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埜容说在创刊号中“只见‘苍蝇’，不见‘宇宙’”。林语堂很快写了《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③予以回击。胡风《“过去的幽灵”》^④对周作人这个“当年为诗底解放而斗争过了的《小河》底作者”写作落伍于时代的旧体诗表示失望，说：“现在在这里‘谈狐说鬼’‘街头终日听谈鬼’的作者，当年却热心地为我们翻译了《过去的幽灵》（爱罗先珂的一篇讲演——引者）。”他于是问道：“那么，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胡风这里显然有一个误会，把打油诗中的内容当成周作人的实际生活了。曹聚仁出来解围，他说：“《人间世》刊载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引起了许多批评；诗是好的，批评也是对的。”指出周作人经历了从“浮躁凌厉”到“思想消沉”的思想变迁，这条途径可以名之为“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不过，周作人并没有“厌世冷观”，“炎炎之

① 《人间世》除了少数几期外，每期刊首都有文化名人的照片。尽管如此，周作人的照片在创刊号上登出还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②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

③ 1934年4月16日《申报·自由谈》。

④ 1936年4月16日、17日《申报·自由谈》。

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①这时,林语堂又写《周作人诗读法》^②为周作人辩护,说他的诗“寄沉痛于幽闲”,又说:“吾素最反对清淡亡晋之论……后之论史者,每谓清淡误国,不啻为逆阉洗煞,陋矣,且亦冤矣。”关于自寿诗事件,鲁迅的意见较为公允。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刺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谅,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党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他又在同年5月6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类似的话:“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谅,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遗憾的是,鲁迅的意见并没有能够及时地发表。《五十自寿诗》事件的发生是有着深刻的文学斗争背景的,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了。

1935年初,周作人和胡风之间还有过一次论争。周作人曾引戈尔特堡批评霍理斯所说的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以自譬,胡风在《林语堂论》^③中指出:“霍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周作人作《霍理斯的时代》^④,嘲笑胡风不曾知道霍理斯有这么一个他的时代,无所谓有也无所谓“过去”。胡风写了《霍理斯的时代及其它》^⑤加以反驳,他说他的意思是“我们所处的尘世和戈尔特堡赞美霍理斯的时代不同”。文章有两个要点:其一批评“霍理斯底根本态度”,“论到他的‘以生物学人类学性学为基础’而写的‘犯罪学的书’,‘文化及文艺上的批评文章’,以及由‘性心理学研究’‘了解人生的态度’,如果真像知堂先生所说的,我以为那里面决不会有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存在。不是性的关系规定了社会人生,相反地,每一种关于性的迷信或道德成见都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反映。所以,离开了社会的土台,只是由‘性心理学研究’了解人生的态度,结果把人从社会的存在还原为自然的存在,那所谓人生态度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就很难索解”。其二,认为所谓“明净的对人生社会的观照态度”“骨子里和历史的命定论并不是两个东西,虽说是公平地对于两方面都没有架打,

① 曹聚仁:《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1934年4月24日《申报·自由谈》。

② 1934年4月26日《申报·自由谈》。

③ 1935年1月《文学》4卷1号。

④ 1935年1月2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135期,收入《苦茶随笔》。

⑤ 1935年3月《文学》4卷3号。

但实际上却是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他诘问道：“我不懂，连生命都朝不保夕的中国大众为了‘求生’为了‘求胜’的‘热诚’为什么反而是可嘲笑的东西？”他另有一篇《霭理斯·法郎士·时代》^①，对周作人所欣赏霭理斯的“明净的对人生社会的观照态度”进行讽刺。胡风这时的剖析就深入多了，接触到了周作人思想上一些根本的局限。

自寿诗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吸引了人们对周作人的注意，不同的派别都力求对周作人做出合乎自己立场的解释。这刺激了周作人研究，出现了几篇代表着不同立场的重要研究文章，它们是左翼批评家许杰的《周作人论》^②，周作人的追随者废名的《知堂先生》^③《关于派别》^④，自由派批评家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⑤，这些文章代表着30年代认识周作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许杰的《周作人论》试图以唯物史观来评析周作人所走的道路，其批评方法属于社会学批评的范畴。该文基本观点如下：一、从文学有用论到文学无用论，从人道主义的文学主张到无所谓的趣味的言志的文学的表现，这是周作人日趋消沉的文学道路。二、“周作人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他虽然是一个新文坛上的人物，但实在却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因为他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所以，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只是一些浅薄的人道主义。”“因为他是一个绅士，是一个穿上新的衣裳的士大夫，所以，他的意识，是到处同封建思想结合着的。”三、“周作人的思想的落后，并不是无因的；分开来说，第一是属于他的认识问题，第二是属于他的意识问题。”前者堕入了机械的循环论的谬误，后者是“士大夫气质”羁绊住了他。四、“周作人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的成绩，综合的说起来，最大的还在于他的介绍西洋文学，尤其是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许杰写作此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冷静客观地研究，而是现实的文学斗争的需要。文章虽然不乏深入之处，但整体上有着机械、简单化的毛病，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深刻透视力并没有发挥出来。许杰的观点，如说周是“穿上近代的衣裳的士大夫”等，对以后很长时间里的周作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许杰的文章和其他左翼青年批评家的文章一样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在30年代这个国事蜩螗、内忧外患都空前严重的时代，对“周作人”进行理论上的清算是有着历史的合

① 1935年3月《太白》1卷12期。

② 1934年7月《文学》3卷1号。

③ 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13期。

④ 1935年4月20日《人间世》26期。

⑤ 1934年12月《青年界》6卷5期。